

論翟理斯對柳宗元散文的創意詮釋

Discussion on Herbert A. Giles' Creative Interpretation of Liu Tsung-Yüan's Prose

梁鑑洪 (Leung Kam-hung) *

翟理斯 (Herbert Allen Giles, 1845-1935) 是 19 世紀末期至 20 世紀初期的英國漢學家，於 1867 年被英國派來中國，起初是英國駐華使館的翻譯學生，其後歷任天津、寧波、廣州、上海等地的英國領事館翻譯，以至助理領事、領事等職。1893 年以健康欠佳為由返回英國，於 1897 年成為英國劍橋大學第二任漢學教授。¹

翟理斯的英文譯著相當豐富，稱得上是著名漢學家。比較具代表性的有 *Chung Tzu* (《莊子》)、*Adversaria Sinica* (《耀山筆記》)、*Strange Stories from a Chinese Studio* (《聊齋誌異》)，翟理斯的《聊齋誌異》英譯共有三個版本，分別是 1880、1909、1916 版。

翟理斯編輯和英譯的 *Gems of Chinese Literature* (《中國文學選粹》) 更是其譯著的代表作，是第一本有系統編譯做英文的中國散文選集，此書於 1884 年初版，後於 1922 年出版了增訂本。此外翟氏又編寫了 *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中國文學史》)。本文的根據是 1922 年版的《中國文學選粹》並以翟氏編譯的《中國文學史》為主要參考。

翟理斯的《中國文學選粹》一共選譯了柳宗元六篇散文，分別是“Revenge”(《駁復讎議》)、“Catching Snakes”(《捕蛇者說》)、“Congratulations on a Fire”(《賀進士王參元失火書》)、“Beauties of Buddhism”(《送僧浩

初序》)、“Is there a God?”(《小石城山記》)、“Pas Trop Gouverner”(《種樹郭橐駝傳》)。

本文只選其中三篇討論，第一篇是《送僧浩初序》、第二篇是《小石城山記》、第三篇是《種樹郭橐駝傳》。從翟氏翻譯這三篇散文的英文題目來看，並不是照中文直譯的方式，可以說是頗有創意的英譯。原文的題目與翟氏的英譯外表上是毫無關係，故此，本文的目的是想指出這種創意英譯是不是符合作者柳宗元的原意？是否對柳宗元這三篇散文的理解有所偏差？

本文分四大段作出討論，先是簡述翟理斯對柳宗元的評價，然後分別論述翟氏對柳宗元這三篇散文的詮釋。

一、翟理斯對柳宗元的評價

翟理斯很欣賞柳宗元，他在《中國文學選粹》對柳宗元有一簡單的描寫，認為柳宗元是一個多才多藝的文學家，翟氏云：「A most versatile writer」。²所謂多才多藝，翟氏在《中國文學史》指出柳宗元不單是詩人，也是散文家、又是書法家，更官至禮部的祕書，翟氏云：「Besides being poet, essayist, and calligraphist, he was a Secretary in the Board of Rites.」。³翟氏更稱讚柳宗

* 作者現為香港樹仁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兼任講師。

1 王紹祥，「西方漢學界的「公敵」——英國漢學家翟理斯(1845-1935)研究」(福州：福建師範大學專門史博士論文，2004)，頁1。

2 Herbert A. Giles, *Gems of Chinese Literature* (Shanghai: Kelly and Wash Limited 1922), p. 131.

3 Herbert A. Giles, *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New York: D Appleton and Company, 1901), p. 192.

元留下來的少量散文，都是風格純正、表達中肯之作，很難有人會超過他，翟氏云：「Liu Tsung-yüan (773-819) has left behind him much that for purity of style and felicity of expression has rarely been passed.」⁴

柳宗元字子厚，他是唐代大詩人是毫無疑問的，他的詩有一百四十五首，大部分是貶官以後之作。⁵以數量而論，柳宗元的詩歌數量不算多，魏慶之《詩人玉屑》引《室中語》云：「人生作詩不必多，只要傳遠。如柳子厚，能幾首詩？萬世不能磨滅。」⁶柳宗元的詩歌包括古、今體詩，因為其獨特風格而在唐代詩壇大放異彩，是人所共知的。⁷

子厚是散文家，更是無人會否定。在傳統文學批評裏，柳宗元是古文大家，他的作品可說是古文的典範。自明代茅坤編訂了《唐宋八大家文鈔》，子厚成為「唐宋八大家」之一，他的作品也被看成了古文典範。⁸子厚在唐代散文創作上是用功最多，而創作量也是最多的散文大家，他在文學創作的成就超過韓愈，尤其是他的雜文、寓言、山水遊記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在寓言與山水遊記這兩種文體的貢獻尤為突出，這是韓愈和其他同時代的唐代文學家不能企及的。⁹

至於柳宗元的書法，甚有家學淵源，他在〈亡姊崔氏夫人墓誌蓋石文〉謂其姊「善隸書」。¹⁰這裡的崔氏夫人，是子厚長姊，擅長隸書，子厚自幼即與其姊居住，無疑也會受到長姊的書法影響。¹¹子厚曾謂自己工於

書，其〈報崔黯秀才書〉云：「凡人好辭工書者，皆病癖也。吾不幸蚤得二病。」¹²此外，他於〈與呂恭論墓中石書〉云：「僕早好觀古書，家所蓄晉魏時尺牘甚具，又二十年來，遍觀長安貴人好事者所蓄，殆無遺焉。以是善知書，雖未嘗見名氏，望而識其時也。」¹³如此看來，子厚年輕時即與書法結緣，不僅有家藏「晉魏時尺牘甚具」，更「遍觀長安貴人好事者所蓄」，對這些書法藏品長期觀摩、薰陶、習練、辨識，使得年輕的子厚既「善書」又「善知書」。¹⁴

陶宗儀《書史會要》謂柳氏善書，著有〈筆精賦〉，論書法之妙，其云：「勒不貴臥，側常患平，努過直而力敗，趨當存而勢生，策仰收而暗揭，掠右出而鋒輕，啄蒼皇而疾掩，磔礮趨以開撐。此永字八法，足以盡書法之妙矣。」¹⁵「掠右出」可能是誤寫，據陶宗儀：《書史會要》，引《永字八法禁經》作「掠左出」。¹⁶

子厚的「永字八法」用現在的話說就是：橫筆不宜平臥，側筆患平正，豎筆要屈中見直，挺勁有勢，不要呆板無力，鉤筆如跳躍，沉實有力，仰橫如揚鞭策馬，長撇左出，起筆重而出鋒輕。短撇用筆急促，銳而斜下，如急速撒網。¹⁷

除了文學與書法，子厚的官職也不低，翟氏謂子厚是「Secretary in the Board of Rites」，應該是《新唐書》所載，子厚曾官至「禮部員外郎」。¹⁸《舊唐書》則作：「尚書禮部員外郎」。¹⁹

4 Herbert A. Giles, *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p. 191.

5 高文、屈光，〈前言〉，《柳宗元選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頁3。

6 [宋]魏慶之編，王仲聞校，《詩人玉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冊上，頁121。

7 孫昌武，《柳宗元傳論》（北京：中華書局，2019），頁275。

8 同上註。

9 同註7，頁276。

10 [唐]柳宗元，《柳河東集》（北京：商務印書館《國學基本叢書》本，1929），冊2，頁104。

11 尚永亮，〈柳宗元書法造詣與承傳論略〉，《文藝研究》，2016.4: 115。

12 柳宗元，《柳河東集》，冊2，頁11。

13 柳宗元，《柳河東集》，冊4，頁102。

14 尚永亮，〈柳宗元書法造詣與承傳論略〉，頁115。

15 [元]陶宗儀，《書史會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無出版日期），卷五，頁2。

16 陶宗儀，《書史會要》，卷九，頁2。

17 江凌雲，〈柳宗元的詩及書法〉，《青少年書法》，2002.3: 27。

18 [宋]歐陽修，《新唐書》（臺北：藝文印文書館影印武英殿刻本《二十五史》本，1956），冊3，卷168，頁10，總頁1989。

19 [後晉]劉昫，《舊唐書》（臺北：藝文印文書館影印武英殿刻本《二十五史》本，1956），冊3，卷160，頁20，總頁2103。

綜觀翟理斯對柳宗元的描述是適切的，子厚是多才多藝的文學家。而且他的散文形式與內容都是多樣性。下文茲闡述翟氏英譯的子厚散文。

二、論〈送僧浩初序〉“Beauties of Buddhism”的詮釋

子厚的〈送僧浩初序〉，翟氏英譯此篇的題目是“Beauties of Buddhism”，²⁰此英譯題目用中文理解就變成「佛教的美善」，與原本的題目相差很遠，顯示了翟氏對〈送僧浩初序〉作了宗教的詮釋。翟氏這英譯題目是根據子厚在文中表示佛教思想與中國傳統儒家思想多有相合之處。

這篇散文是子厚在柳州任刺史時所作，送給龍安海禪師的弟子浩初之序文。²¹子厚在文中對佛教多加褒揚，他說：「浮圖誠有不可斥者，往往與《易》《論語》合。誠樂之，其於性情爽然。不與孔子異道。」²²翟氏英譯云：「In point of fact, there is much in Buddhism which could not well be denounced; scilicet, all those tenets which are based on principles common to our own sacred books. And it is precisely to these essentials, at once in perfect harmony with human nature and the teachings of Confucius, that I give in my adhesion.»²³此外，子厚亦讚賞佛教中人安閒不爭的人生態度，他說：「且凡為其道者，不愛官，不爭能，樂山水而嗜閑安者為多，吾病世之逐逐然唯印組為務以相軋也。」²⁴翟氏英譯是：「Buddhism admits no envious rivalry for place or power. The majority of its adherents love only to lead a simple life of contemplation amid the charms of hill and stream. And when I turn my gaze towards the hurry-scurry of the age, in

its daily race for the seals and tassels of office.」²⁵

子厚在此文指出韓愈只理解佛教的表面，他云：「退之忿其外而遺其中，是知石而不知韞玉也。」²⁶翟譯云：「But Han Yü misses the kernel while railing at the husk. He sees the lode, but not the ore.」²⁷韓愈與子厚是知交，但是兩人對佛教態度迥異。翟氏認為柳宗元的思想比韓愈開闊，可以接受佛教思想，翟氏在柳宗元的生平簡介中說：「His breadth of intelligence allowed him to tolerate Buddhism, in direct opposition to the utterances of Han Wên-kung.」²⁸

從〈送僧浩初序〉的內文而論，翟理斯英譯的題目“Beauties of Buddhism”是適切的，合乎文中的內容。章士釗的《柳文指要》歸納了〈送僧浩初序〉的思想為六點，茲引述如下：

(一) 浮圖之言，與《易》、《論語》合，聖人復生，不可得而斥，退之於聖人何如？(二) 浮圖於性情，不與孔子異道，退之如何自安頓其性情？(三) 浮圖之言，勝於莊、墨、申、韓之怪僻險賊，揚雄于莊、墨、申、韓有取，胡乃退之於浮圖無取？(四) 退之攻浮圖以夷，此乃混名實而一之；由退之之言，不獨季札、由余不可友，而且退之自張為道統之五帝、三王，應先去東夷之人舜，與西夷之人文王。(五) 退之罪浮圖以跡，以跡而言，子厚亦不樂，蓋石之中有韞玉，退之胡乃忿其外而遺其中？(六) 浮圖不愛官，不爭能，樂山水而嗜閑安，子厚因從之遊，而退之罪焉；退之之意，是否要求子厚從己之後，逐逐然唯印組為務以相軋？是否退之三上宰相書不報，即悄然逸去，此一套忍辱含垢本領，將傳之貶竄十年不得量移之子厚？²⁹

20 Herbert A. Giles, *Gems of Chinese Literature*, p. 137.

21 柳宗元，《柳河東集》，冊4，頁38。

22 同上註。

23 同註20。

24 同註21，頁39。

25 同註20，pp. 137-138.

26 同註21，頁39。

27 同註20。

28 同註20，p. 131.

29 章士釗，《柳文指要》（北京：中華書局，1971），冊上，卷25，頁764-765。

大抵言之，子厚認為佛教與孔子之道沒有分岐，比之《莊子》、《墨子》、《申子》、《韓非子》等思想更純正，韓愈只知道佛教僧人生活的外表，沒有注意僧人內心修養的內涵，以僧人浩初為例，指出僧人性情愛安閒，不追求官場名利。³⁰

從內容而論，翟理斯英譯的題目“Beauties of Buddhism”，把此文所論的佛教美善都表達出來了。但從文章的體裁與整體翻譯而論，翟氏的翻譯有些問題值得探討。

首先是英譯題目“Beauties of Buddhism”失去了原題〈送僧浩初序〉的文體意義。「序」是唐代一種文體，明人徐師曾《文體明辨序說》云：「按《爾雅》云：『序，緒也。』字亦作『敘』，言其善敘事理次第有序若絲之緒也。」³¹〈送僧浩初序〉就是「善敘事理」之序。有學者認為「序」是從漢代開始，後人沿用不廢，到唐代而造其極，唐代文人創作了一種新的序體文—「贈序」，可說是唐代文學中的奇葩。³²唐代的「贈序」有別於「書序」，初唐的「贈序」是在親友離別之際，往往贈以叮嚀之言，「贈序」的內容，通常是敘說彼此的友誼，給予對方勉勵之言。³³從韓愈與柳宗元開始，「贈序文」有所創新，不僅是惜別贈言，也就著一些議題作出自己的看法，使「贈序文」具有一定的思想深度。³⁴在柳宗元的文集中，共收錄了四十六篇「贈序」作品，其中九篇是贈序予佛教僧人的，〈送僧浩初序〉是其中一篇。翟氏英譯的題目，完全忽略了此文的文體意義。

此外，翟氏的整體翻譯有不少遺漏之處，例如將原文題及的《易》、《論語》譯做「sacred books」沒有把原

意翻譯出來。³⁵而文中的「莊墨申韓」³⁶是指《莊子》、《墨子》、《申子》、³⁷《韓非子》等先秦諸子，翟氏只用「heterodox writers」概括之，³⁸不能把子厚的原意清楚翻譯出來，也不能把子厚的思想淵源明確表達。

翟理斯翻譯〈送僧浩初序〉題目做“Beauties of Buddhism”只能從思想上理解此文，不能從文體上理解此文。

三、論〈小石城山記〉“Is There a God?”的詮釋

理氏英譯〈小石城山記〉的題目是“Is There a God?”，此英譯的題目反映了翟氏對此篇散文作了神學詮釋，使讀者認為〈小石城山記〉是一篇討論造物主是否存在的散文。翟氏如此翻譯此題目，是因為子厚在此文第二段對「造物者」的有無作出疑問。

子厚在此文沒有為「造物者的存在」(the existence of God)下一定論，而是懷疑有無造物者。〈小石城山記〉云：「吾疑造物者之有無久矣。」翟譯：「Now, I have always had my doubts about the existence of God.」³⁹子厚面對「小石城山」的美景，先是讚嘆造物主的奇妙作為，認為真有造物主。〈小石城山記〉云：「及是，愈以為誠有。」翟譯：「but this scene made me think he really must exist」。⁴⁰可是這麼好的美景，為甚麼不放在京都，卻在此荒蕪的永州出現，以致無人欣賞，〈小石城山記〉云：「又怪其不為之中州，而列是夷狄，更千百年不得一售其伎。」翟譯：「At the same time, however, I began to wonder

30 柳宗元，《柳河東集》，冊4，頁38。

31 [明]徐師曾，《文體明辨序說》（香港：太平書局，1965），頁135。

32 張靜，〈唐代序文研究述評〉，《鄭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34.3: 89。

33 胡楚生，〈柳宗元「贈序文」探究〉，《興大人文學報》33（2003.6）：2。

34 同註32，頁91。

35 Herbert A. Giles, *Gems of Chinese Literature* p. 137.

36 柳宗元，《柳河東集》，冊4，頁39。

37 [漢]司馬遷，《史記》（臺北：藝文印書館影印《乾隆武英殿刻本二十五史》本，1956），冊2，卷63，頁5，總頁860。

38 同註35。

39 同註35，p. 138.

40 Herbert A. Giles, *Gems of Chinese Literature*, p. 138.

why he did not place it in some worthy centre of civilization, rather than in this out-of-the way barbarous region, where for centuries there has been no one to enjoy its beauty.」⁴¹ 最後子厚還是否定造物主的存在，〈小石城山記〉云：「是固勞而無用，神者儻不宜如是，則其果無乎！」翟譯：「And so, on the other hand, such waste of labour and incongruity of position disposed me to think that there could not be a God after all.」⁴² 如果有造物主，像永州的美好山水，應把它放在中州京都，不該廢置於荒夷之地，但造物主竟然做了這種不適當的事情。那麼造物主之有無，確足令人懷疑。⁴³

子厚實際上是否定了「造物主」的存在。理氏英譯的題目“Is There a God?”只是從表面闡釋〈小石城山記〉的思想。從柳宗元的天人思想而言，他認為天是沒有意志的、不是賞善罰惡的主宰，他在〈天說〉云：

上而玄者，世謂之天；下而黃者，世謂之地。渾然而中處者，世謂之元氣。寒而暑者，世謂之陰。是雖大，無異果蓏癰痔草木也。假而有能去其攻穴者，是物也，其能有報乎？蕃而息之者，其能有怒乎？天地，大果蓏也；元氣，大癰痔也；陰陽，大草木也，其烏能賞功而罪禍乎？功者自功，禍者自禍，欲望其賞罰者大謬。呼而怨，欲望其哀且仁者，愈大謬矣！⁴⁴

子厚在此所講的天是物理之天，是一形而下之天，此形而下之天與大自然的植物果蓏、癰痔、草木沒有分別，都是無意識的自然現象，有利用它們者，它們不懂報答；有害害於它們者，它們也不懂憤怒。故此，天不能給人任何賞罰，希望天能夠賞善罰惡是荒謬的。⁴⁵

天人各有其活動範圍，也各有其規律，各不相干，子厚〈答劉禹錫天論書〉云：「猶天之不謀乎人……其事各行不相預。」⁴⁶ 人與天各有範疇，彼此行事各不干預。

子厚在永州所寫的〈祭呂衡州溫文〉則否定了「神」的存在，其云：「嗚呼！天乎！君子何厲，天實仇之；生人何罪，天實讎之。聰明正直，行為君子，天則必速其死。道德仁義，志存生人，天則必夭其身。吾固知蒼蒼之無信，莫莫之無神。」⁴⁷ 子厚在此文中，是藉祭呂溫而述己意，那些聰明的君子，對社會有貢獻的人，就短命早死，可見蒼蒼之天無信實，莫莫塵世無神明。

子厚在〈小石城山記〉對「造物者」先是懷疑其有無，然後又藉小石城山之美，不在京都出現，反而在此蠻荒野地出現，實在是一錯誤布置，若真有「造物主」，就不會有這種錯置發生，他實際是否定了「造物主」的存在。⁴⁸ 翟氏用“Is There a God?”做英譯本的題目，也表達了存疑性，尚算適切。但這種含有神學性的詮釋，只是表面理解〈小石城山記〉。

子厚的目的，是藉小石城山的奇特景致發洩胸中的不平遭遇，所以他質疑造物者、懷疑天命，是心中的自然反應。子厚這種思想可溯源至屈原，正如《史記·屈原賈生列傳》云：「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盡智以事其君，讒人間之，可謂窮矣。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⁴⁹ 屈原到人生窮極之時，就呼天，這呼天之意，按《史記》所講屈原作〈離騷〉是因為怨，那麼呼天就變成怨天了。屈原在〈離騷〉云：「皇天無私阿兮，覽民德焉錯輔。」⁵⁰ 文字上是皇天是無私，有才之人會被放在適當位置。但從屈原的生平而言，被小人讒言

41 同上註，pp. 138-139.

42 同註 40，p. 139.

43 何沛雄，《永州八記導讀》（香港：中華書局，1990），頁 10。

44 柳宗元，《柳河東集》，冊 3，頁 54-55。

45 陳錫龍，「柳宗元天人思想研究」（臺北：臺北市立教育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碩士論文，2008），頁 122。

46 柳宗元，《柳河東集》，冊 4，頁 97-98。

47 柳宗元，《柳河東集》，冊 5，頁 82-83。

48 陳耀南，《古文今讀續編》（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9），頁 188。

49 司馬遷，《史記》，冊 2，卷 84，頁 1-2，總頁 1004。

50 [宋]洪興祖，《楚辭補注》（臺北：藝文印書館，1986），卷 1，頁 19，總頁 45。

所害，被國君疏遠，原本是對天正面的評價，就變成對天的懷疑之言。在屈原的〈哀郢〉一開始就說：「皇天之不純命兮，何百姓之震愆。」⁵¹ 質問天命不純的思想更明顯。

屈原對子厚的影響相當深遠，《新唐書》云：「柳宗元……貶邵州刺史，不半道，貶永州司馬。既竄斥，地又荒蕪，因自放山澤間，其堙厄感鬱，一寓諸文，做離騷數十篇，讀者咸悲惻。」⁵²《舊唐書》也有類似記載云：「為騷文十數篇，覽之者為之悽惻。」⁵³ 子厚與屈原都有被貶官的經歷，嘗到被小人讒言毀謗的痛苦，藉文章表達胸中憤慨，子厚在〈弔屈原文〉中自比屈原謂：「後先生蓋千祀兮，余再逐而浮湘。……先生之不從世兮，惟道是就。」⁵⁴ 他自問與屈原都是「惟道是就」，雖被讒謗貶官，仍然有自己的立場與為官原則。

子厚「窮」在永州，不但呼天，更進而對天理發生了懷疑，甚至否定天理的存在。在永州的流放生活，對曾在京都任「禮部員外郎」的柳宗元來說，是極端難受的。況且，子厚被流放的原因，是因為朝廷黨爭，然而他自問清白無辜，理應不會受到這種貶謫。但現實環境不容他公開表示抗議，惟有寄情山水，借景物的描寫，來發洩自己的悲憤。他指明像永州小石城山的美好山水，不在中州出現，卻在蠻荒之地出現，正暗喻自己的才能，不受朝廷重用，被閒置於此蠻荒之地。茅坤認為柳宗元寫山水遊記，是「借石之瑰璋，以吐胸中之氣」。⁵⁵ 日人清水茂說：「在柳宗元的文學中，最強烈地表現的，是他在永州時期的作品，這是因為在永州的生活體驗，對柳宗元的影響最大的緣故。」⁵⁶ 所以，柳宗元寫山水遊記的動機，不但以發現被遺棄的山水之美來反映他自己的見棄，並且在他的山水遊記裏，還曲折地提出了他對

現世間的不滿和批評。⁵⁷

故此，翟理斯把〈小石城山記〉做了神學闡釋，把此文的題目英譯做“Is There a God?” 祇是在文字的表面闡釋〈小石城山記〉，不能從子厚整體思想與遭遇理解此文，忽略了柳宗元借山水表達個人胸中的憤懣，他的目的不是追尋有無創造主，這個不是他關心的，他否定了創造主，是因為他生平的經歷是不公平的，真有創造主的話，他應該不會懷才不遇，被貶在蠻荒之地，理應在京師做朝中大臣。

如果，翟理斯在他編譯的《中國文學史》對此文做些深層次的剖析，可以使讀者更深入理解柳宗元的文學目的，可惜翟理斯沒有做這一步功夫。

四、論〈種樹郭橐駝傳〉“Pas Trop Gouverner”的詮釋

〈種樹郭橐駝傳〉翟理斯英譯此題目做“Pas Trop Gouverner”原文是法文，中文意為「不可過多管轄」。這個英譯題目，表示出翟氏對這篇散文作出政治哲學的詮釋，翟氏的根據是柳宗元藉一個種樹的小人物表達他的政治理念，可說是加上了政治哲學的闡釋。

用小人物表達哲學思想，是柳宗元寫人物傳記的特性，除了〈種樹郭橐駝傳〉之外，還有〈宋清傳〉、〈童區寄傳〉、〈梓人傳〉都是借小人物發表其政治思想。這篇寫於貞元年間的〈種樹郭橐駝傳〉，⁵⁸ 是借一位種樹的小人物，藉種樹的道理，順著樹木自然之理而讓其自然生長，比喻國家管理百姓，也應讓百姓按實際情況而發展，不應過多管轄。

郭橐駝是一個有姓而無名的人，因其駝背而得此

51 同上註，卷4，頁10，總頁20。

52 歐陽修，《新唐書》，冊2，卷168，頁9，總頁1989。

53 劉昫，《舊唐書》，冊3，卷160，頁20，總頁2103。

54 柳宗元，《柳河東集》，冊3，頁90。

55 何沛雄，《永州八記導讀》，頁11。

56 清水茂著，華山譯，〈柳宗元的生活體驗及其山水記〉，收入人民文學出版社編輯部編，《中國古典散文研究論文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9），頁162。

57 何沛雄，《永州八記導讀》，頁11-12。

58 尚永亮、洪迎華編選，《柳宗元集》（南京：鳳凰出版社，2014），頁207。

名，〈種樹郭橐駝傳〉云：「郭橐駝，不知始何名。病瘵，隆然伏行，有類橐駝者，故鄉人號之『駝』。」⁵⁹ 翟譯：「I do not know what Camel-back's real name was. Disease had hunched him up behind, and he walked with his head down, like a camel. Hence, people came to give him the nickname of Camel.」⁶⁰ 郭橐駝對鄉人為他起的別名，不單沒有反感，反而欣然接受。〈種樹郭橐駝傳〉云：「駝聞之曰：『甚善，名我固當。』因舍其名，亦自謂橐駝云。」⁶¹ 翟譯：「“Capital!” cried he, when he first heard of his sobriquet; “the very name for me.” And thereafter he entirely left off using his proper name, calling himself “Camel-back.”」郭橐駝的職業是種樹，因其所種的樹枝葉茂盛，果實纍纍，長安城的富豪如果要修建園林，以及那些經營水果買賣的人，都爭相請郭橐駝幫忙。

有人請教郭橐駝植樹之道，郭的回答是：「橐駝非能使木壽且孳也，能順木之天，以致其性焉爾。」⁶² 翟譯：「Old Camel-back cannot make trees live or thrive. He can only let them follow their natural tendencies.」⁶³ 子厚的目的不停留於郭橐駝的過人種樹技巧，而是藉「順木之天，以致其性」這一概念，發揮其政治理念，他藉著與郭橐駝的問答方式，發表「煩政擾民」的政治哲學。

問者曰：「以子之道，移之官理可乎？」⁶⁴ 翟譯：「“Can these principles you have just now set forth be applied to government?” asked his listener.」⁶⁵ 很明顯，子厚是有心作出此一切問方式，在子厚的筆下，郭橐駝很有技巧的說出為政治民之道云：

曰：「我知種樹而已，理非吾業也。然吾居鄉，見長人者好煩其令，若甚憐焉，而卒以禍。旦暮

吏來而呼曰：『官命促爾耕，勸爾植，督爾穫。蚤繰而緒，蚤織而縷，字而幼孩，遂而雞豚。』鳴鼓而聚之，擊木而召之。吾小人輟飧餐以勞吏者，且不得暇，又何以蕃吾生而安吾性耶？故病且怠。若是，則與吾業者其亦有類乎？」⁶⁶

翟譯：

“Ah!” replied Camel-back, “I only understand nursery-gardening: government is not my trade. Still, in the village where I live, the officials are for ever issuing all kinds of orders, as if greatly compassionating the people, though really to their utter injury. Morning and night the underlings come round and say, ‘His Honour bids us urge on your ploughing, hasten your planting, and superintend your harvest. Do not delay with your spinning and weaving. Take care of your children. Rear poultry and pigs. Come together when the drum beats. Be ready at the sound of the rattle.’ Thus are we poor people badgered from morn till eve. We have not a moment to ourselves. How could any one flourish and develop naturally under such conditions? It was this that brought about my illness. And so it is with those who carry on the gardening business.”⁶⁷

子厚筆下的小人物，都是用其專業知識類比管治，〈種樹郭橐駝傳〉也是如此，郭橐駝早已指出種樹不能太多干擾樹木生長，他對官吏的批評是「好煩其令」，即管治過多，官吏早晚都到村裏催促村民耕田、下種、

59 柳宗元，《柳河東集》，冊3，頁69。

60 Herbert A. Giles, *Gems of Chinese Literature*, p. 139.

61 同註59。

62 同註59。

63 同註60。

64 同註59，頁70。

65 同註60，p. 140.

66 同註59，頁70。

67 Herbert A. Giles, *Gems of Chinese Literature*, p. 140.

收割、繅絲、織布、撫養孩子、餵養雞豬。又鳴鼓擊木召喚百姓，百姓疲於奔命，為了招呼官吏，吃飯的時間也沒有，可謂煩政擾民。

翟氏英譯這段文字，都是直接把其文意英譯，沒有改變其內容。而這段文字也是翟氏英譯題目“Pas Trop Gouverner”的根據，這英譯題目與原本的題目〈種樹郭橐駝傳〉好像沒有關係，然而，這段文字的意思是表達出官府不應過度管轄百姓，以免影響百姓的生活。翟氏英譯此題目是順著原著的政治思想而來，翟氏對此文做了政治哲學的解讀，題目是合適的。

但有一點比較可惜，翟氏沒有對子厚寫〈種樹郭橐駝傳〉的歷史背景做考查，他在《中國文學史》也沒有做這種闡釋。因而不能說明擾民背後的原因。翟理斯雖然在《中國文學選粹》英譯了不同文學家的文獻，但對作者的生平卻了解不多，單以柳宗元的生平簡介為例，在《中國文學選粹》之中只講述了子厚與韓愈是知交，而且子厚好佛學。⁶⁸ 在他的《中國文學史》也有相同的描述。⁶⁹ 而在翟氏的另一著作《古今姓氏族譜》(A Chinese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描述柳宗元的生平是：「After rising to be secretary in the Board of Rites, he became involved in the conspiracy of 王叔文 Wang Shu-wên, and in 815 he was banished to Liu-chou in Kuangsi, with the appointment, in which post he died.」⁷⁰ 其意是說柳宗元位至禮部員外郎，因王叔文事件而受牽連，於公元 815 年被貶到廣西做柳州刺史，而且病歿於任所。

從上文的描述，顯見翟理斯對柳宗元的背景有誤解。據史書所載唐順宗於永貞元年（805）即位，子厚被擢升為禮部員外郎，《舊唐書》云：「順宗即位，王叔文、韋執誼用事，尤奇待宗元。與監察呂溫密引禁中，

與之圖事。轉尚書禮部員外郎。」⁷¹ 順宗在位不足一年，即被太子李純迫宮，太子李純即帝位為憲宗，王叔文不受重用，子厚被貶永州司馬，《新唐書》云：「俄而叔文敗，貶邵州刺史，不半道，貶永州司馬。」⁷² 其後於元和十年（815）被派往柳州，《舊唐書》云：「元和十年，例移為柳州刺史。」⁷³

翟理斯對柳宗元的背景理解不足，對子厚所寫的散文的背景也理解不足，所以不能更深入的闡釋〈種樹郭橐駝傳〉，只能做文字的翻譯。柳宗元生於唐代宗大曆八年（773），安史之亂結束，大局尚未平定。唐室平安史之亂是靠回紇兵，因而回紇兵在長安橫行。唐德宗時回紇之勢稍斂，又有吐蕃之亂繼之而起。⁷⁴ 柳宗元成長在動亂的社會，對人民遭遇的困難有一定的體會。⁷⁵

在戰爭紛亂的社會，社會物質自然缺乏，最基本的糧食物資，要靠農民生產。官府這種「好煩其令」、「促爾耕」、「蚤繅而緒」、「蚤織而縷」，等由官府督促農民生產的政策，實則是擾民政策，政府的目的是要人民加速生產，應付社會對物資的需求，違反了農作物生產所須的時間，就如郭橐駝所言「爪其膚以驗其生枯，搖其本以觀其疏密。」⁷⁶ 官府中人為了促使農民加快生產，經常到農村巡視，召集村民，名義上是鼓勵生產，實質上是阻礙農民生產。這樣，不單止農民生計受影響，整個社會也因此而糧食不足。

柳宗元藉〈種樹郭橐駝傳〉指責官府違反自然，不懂養民。社會歷經戰亂，民生困苦的世代，應該讓人民集中精神從事生產工作。從農牧生產角度而言，農民是專業人士，官府不應干涉整個生產程序，應該讓農民按天然時序進行生產工作。但郭橐駝所講的情況，是官府不停干預農牧生產，阻礙正常生產秩序。官府這種急功

68 同上註，p. 131.

69 Herbert A. Giles, *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1901, pp. 191-192.

70 Herbert A. Giles, *A Chinese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古今姓氏族譜》) (Shanghai: Kelly & Walsh, Limited, 1898), p. 524.

71 劉昫，《舊唐書》，冊 3，卷 160，頁 19-20，總頁 2103。

72 歐陽修，《新唐書》，冊 3，卷 168，頁 9，總頁 1989。

73 同註 71，頁 20，總頁 2103。

74 錢穆，《國史大綱》（臺北：商務印書館，1977），頁 344-348。

75 孫昌武，《柳宗元傳論》（北京：中華書局，2019），頁 19。

76 柳宗元，《柳河東集》，冊 3，頁 70。

近利的短視政策，不獨農民勞而無工，更使整個國家物資缺乏。

翟氏把〈種樹郭橐駝傳〉譯做“Pas Trop Gouverner”，題目是做了政治哲學的詮釋，但是受翻譯的限制，譯文只能把原文的意思翻譯，不能做到深入剖析，在所不免。然而，翟氏的《中國文學史》也缺乏文學剖析，只把他在《中國文學選粹》的英譯，轉載或節錄至《中國文學史》，缺乏獨到的分析，只給讀者文字的認識，欠缺思想的深度，可說美中不足。

結 論

翟理斯筆下的柳宗元多才多藝，既是詩人、又是散文家、也是書法家。翟理斯選譯三篇柳宗元散文都各有特色。

翟理斯用宗教角度闡釋〈送僧浩初序〉，把題目英

譯做“Beauties of Buddhism”，他掌握了柳宗元在此文討論韓愈對佛教的誤解，子厚論述佛教的好處可與孔子思想媲美，從思想來看，這是適切的題目。可惜，這英譯題目不能表達「序」這種文體的特色，翟理斯也沒有做補充解釋。

翟理斯用神學角度闡釋〈小石城山記〉，把題目英譯做“Is There a God?”，他掌握了子厚對小石城山的奇景讚嘆，產生對造物者的有無作出討論。這個英譯題目只能表達表面的思想。子厚藉小石城山如此美景卻無人欣賞，感嘆自己的遭遇，被棄置在此僻遠之地。

翟理斯用政治哲學角度闡釋〈種樹郭橐駝傳〉，英譯題目做“Pas Trop Gouverner”，意為「不可過多管轄」，此譯名掌握了子厚藉郭橐駝發表的政治理念，可算適切。可惜翟氏對子厚的生平與社會背景不了解，不能指出此文的思想深度。

新書評介徵稿

為推動國際學術交流，並讓國內漢學研究者取得國外新書資訊，本刊「新書評介」專欄徵求對外國語文漢學相關近二年出版新書，進行介紹且兼有評論的書評。文長以 1,000-1,500 字為佳，園地開放，歡迎投稿。書評投稿、惠書和有關事物以及提出建議批評等，請與本刊編輯部聯繫：

ccsnews@ncl.edu.tw